

XIYU HANYU  
TONGXINGSHI

# 西域汉语通行史

马克章/著



汉语在古代西域的通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西域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书在通览我国历史，梳理各朝各代内地说汉语的人口因各种原因向西流动的历史事实之基础上，尽力掌握各个朝代西域说汉语人口的数量及其分布状况，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探究汉语在西域社会通行的情况，并由此进而推断、观察汉文化在西域社会的传播及其所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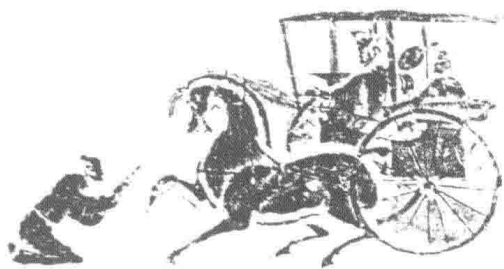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XIYU HANYU  
TONGXINGSHI

# 西域汉语通行史

马克章 / 著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域汉语通行史 / 马克章著.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423-4032-0

I. ①西… II. ①马… III. ①汉语史—研究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8345号

## 西域汉语通行史

马克章 著

---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冯娟

装帧设计 马吉庆

---

出版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730030

网址 [www.gseph.cn](http://www.gseph.cn) E-mail [gseph@duzhe.cn](mailto:gseph@duzhe.cn)

电话 0931-8773136 (编辑部) 0931-8773056 (发行部)

传真 0931-8773255

淘宝官方旗舰店 <http://shop111038270.taobao.com>

---

发行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6 插页 6 字数 52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书号 ISBN 978-7-5423-4032-0 定价 98.00元

---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0931-2607208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序

柴剑虹

三十六年前，我从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调到“红专学校”（市教师进修学校、教育学院前身）任教，和马克章老师成了同事。他教现代汉语课，我讲古代汉语，两门课程有许多契合之处，常在一起相互切磋。那时学校的教员多是从市属各中学调入的，老师们刚刚摆脱了“文革”的羁绊，思想也逐渐“解放”，很想在业务上多下些功夫，在提高自身水平与能力的同时，将所需知识传授给如饥似渴的学员们。在我的印象里，老马是我们这批“老大学生”中最勤奋的一位，也是刻苦钻研，在教学的同时最早步入“科研”领域的老师。现在想来，日后能够担当两千年“西域汉语通行史”这个大课题，那时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几年前，在和当年语文教学界老同事们的一次聚会之后，老马和我聊了他这些年搜寻、积累两千年间西域汉语通行方面的资料，准备撰写一本相关著作的设想。我当然非常赞成——因为这不仅是新疆历史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也是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在中国汉语史研究中的一次有益实践和名副其实的突破。这些年来，我因为参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缘故，对相关出土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晋、唐时期敦煌及西域的“双语”乃至“多语”并行的情况颇感兴趣，但惜无研究。老马这本著作的着眼点是汉语在西部地区的通行史，同时也必然涉及和其他民族语言的交流、应用，相对于西域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研究（这也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西域汉语史的研究反而更加贫乏和滞后。语言文字

本身是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在认真普及新疆历史文化知识时,当然应该对这一区域通行了两千年之久的汉语现象有更加清晰而确凿的认知。对于学界而言,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去厘清新疆汉语通行的史料并加以科学分析,则可以大大拓展人们研究西域文化历史的视野。

据老马在本书“绪论”中所说,他是三十年前在参与调查、研究新疆汉语方言的国家课题时开始关注“汉语通行”这个论题的。实际上,汉语的“普通话”只是现当代的概念,虽然古代的某个时期有“官话”的说法(如南宋时期临安的“官话”、晚近以来北方话系统的各地官话),其实也都是靠近某一种方言的语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汉语不仅依靠各地方言而存在、传承、发展,而且也不断地从其他民族语言中汲取养料而丰富发展。新疆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移民社会,各地区的汉语方言也不断地在新疆进行着交流。因此,新疆的汉语通行史,实际上正是汉语方言的通行史。诚如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中所言:“汉语在西域的通行,始于汉人的进入西域。汉语通行空间的分布,取决于汉人在西域的地域分布。”书中对汉代汉人(戍边士卒、地方移民等)的人数、分布,做了详细的钩沉与统计,说明当时在西域已至少形成了十余个汉语语言岛,当然“岛”的含义,恐怕还不是彼此间不通音问,“完全隔绝”,尽管交流并不通畅,但人员的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汉语不同方言间的渗透力亦不可小觑。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间,体现了中原及江汉地区的各地方言交融特色的汉语,作为西域地区的“官方通用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西域各少数民族语言对于汉语变革、传承、发展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元代维吾尔语对元曲语词的影响,还有目前汉语中已经非常普及的常用词汇(如葡萄、芫荽、琵琶、箏箒等等),佛经东传过程中少数民族翻译家在译经中的杰出作用,都证明了西域的汉语通行史,也是各民族语言的交融史。本书中对汉代以后西域地区“双语现象”乃至“多语现象”的精辟分析,也说明了作者叙述、评论汉语通行新疆的历史,恰是在正视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为了更生动形象地还原民族文化交融的图像,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的统一。新疆,作为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地域最辽阔、各民族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成员,诚如作者在本书“余论”中指出的:“汉语在西域的通行,不仅起到了语言交际的作用,而且它对西域社会的发展和地区文

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材料的翔实,方法的更新,严密的逻辑思辨,清晰的篇章结构,是本书的显著特色,也是我钦佩之处。本书征引的资料,有丰富的传世典籍,有大量的出土文物,有前辈的研究成果,也有国外专家的论著;本书使用的方法,除了借助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之外,多学科交叉综述,二重、多重证据,数字统计,等等方法,都得到了较好的运用;本书在具体的分析、综合中体现出来的逻辑思辨,包括精细推理而又留有余地,缜密而有说服力;本书依时代为序,厘为七章,纵论汉语在西域通行的史实,而每一章中又将新疆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与语言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论述,以求达到“横断面”清晰的效果。因此,这不仅是一部应用语言学的著作,也完全可以作为一部简明的新疆通史来阅读。学术的创新是必须以学术规范为基础的。我认为,学术规范的基本点,就是材料的真实、准确、齐备,语言的简明、通畅、生动,立论明确、推论合理、结论确定又留有余地,一句话,要杜绝假、大、空。我以为,老马的这部著作,是努力去做到这一点的。故乐于为之序,并求学界同道教正。

2013年9月4日于中华书局

---

本序作者系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 绪 论

世界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19 世纪全世界的科学发展,呈现出学科分门越来越细的发展趋势,20 世纪则由分门过细,呈向学科的边缘或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科学的这种发展趋势,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事物内部的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进一步认识。后者往往是在前者发展中的局限性暴露之后的新思考、新发展。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大国。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共同发展史。由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民族的历史地位不同等多种原因,特别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囿,所以对我国各民族、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不同社会生活面的研究都还很不够。这就为我们未来的研究留下了极为广阔的空间。本书的研究课题就是从这个角度受到启发而发现的。

## 一、本书命题的产生

长时间以来,许多时候、许多问题单从某一学科角度入手,往往难以得出人们所理想的科学认识。究其原因,大都因为这一门学科的局限所致。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整个新疆的历史,是新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

同全国情况一样,关于新疆各族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生活侧面的研究都还很不够。即便是有关汉族的情况,汉语



在古代西域(新疆地区)通行的情况等,至今也还仍处于若明若暗的状况。本书命题研究汉语在西域的通行历史情况,就是因此种具体情况而产生的。

学科研究的局限启示了我们。

三十年前,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李荣、傅懋勳二位先生主持的国家六五计划期间重点社科项目(亚澳地区国际合作项目)之子项目(中国部分)——新疆汉语方言分区的调查研究。对新疆学界来说,新疆方言研究几乎是一件从零开始的工作。因为历史的原因,汉语在西域通行两千年来,却几乎无人对其予以关注。不要说方言的研究,就是汉语在这里通行的一般情况,我们也仍难知其详。尽管那次国家下达的关于新疆汉语方言研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汉语在西域通行两千年的状况,以及新疆现代汉语方言形成的大致发展脉络等,作为问题,却一直萦绕在我们这些新疆汉语方言研究参与者的心中。

后来,我在研究确定新疆汉语次方言的代表话时,出于需要,翻阅了新疆通史。尽管阅读十分粗略,但还是发现,至今有许多问题仍然若明若暗。连我这样的历史学门外汉,都朦胧感觉到,许多问题看来确系文献资料缺乏,史学家都十分谨慎地不肯轻率表态。例如,关于西辽时期西域的汉语通行,史学家陈垣先生措辞就十分谨慎。明朝西域汉语的通行,学者们也几乎都避而不谈。我曾就明朝西域汉民的存在线索,请教过时任新疆社科院院长的刘志霄先生。刘先生是新疆史专家。他很客气地说,他自己也纳闷,远的不讲,就拿元朝来说,新疆有那么多汉民,但是到了明朝,史书里竟然找不到他们的下落。这使我感到,单从历史学角度要完全弄清相关问题,其局限已十分明显。看来不得不另辟蹊径,否则,这一问题就难以找到答案。

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的存在,依赖说这种语言的人的社会群体。据此我们有理由说,除了依据历史资料说话之外,依靠语言和操该语种的人口群体之间的互依关系,对语言的社会存在,或操这种语言的人的存在,进行相互推断,这一逻辑应当是具有说服力的。又如,文字是记录语言、把听觉转换成视觉的符号系统。某地有某种文字材料出现,就证明那里曾有它所记录的这种语言存在。二者的相依关系,也给我们带来了依据历史文献之外的发言机会。



已故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引用过几位已故美国学者的话。他们的观点也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美国已故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另一位语言学家柏默(L.R.Palmer)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罗先生所接触系英文版——作者注)(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页,语文出版社,1989年。)当我们仅靠目前历史研究的成果,对我们所关注的西域汉语通行历史状况、新疆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等问题难以厘清时,如果从汉文化在西域传播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协助和启发”,得到我们所期望知道的东西。这实在是很有益的启发。

于是,这便成为我决心进行这一探索的基本想法。即在厘清历代汉语在西域的通行情况的同时,捕捉每一朝代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造成的影响,二者互相作为佐证参照,既可印证汉语的通行,据以得知汉文化的传播、影响;又可透过汉文化的社会传播和影响,判定汉语曾经通行的社会存在。

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新观点、新方法,令我们大受启发、备受鼓舞。它使我们在研究西域汉语的通行,观察新疆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时,毅然突破旧有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限,同时也启发了我们从多学科多角度着眼的创新思维,并给我们尝试探索新方法鼓舞了勇气。由此,我想,依据截至目前新疆历史研究的既得成果,梳理出历来内地说汉语人口西来的状况,掌握历代西域说汉语人口的大致数量及分布,应该可以窥得西域汉语在每一朝代通行的基本情况。进而,借助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对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做出科学的判定。同时,因为汉文化的传播与汉语社会通行的密切关系,所以又可以从特定历史时期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反过来推断这个时期汉语的社会通行状况。其间,大量使用的方法,就是逻辑推论的方法。

就在这时,我在涉猎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专家马大正先生写给另一学者的一句赠言:“作为与多学科密切关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要有一个整体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充分吸收诸学科的研究精华。”马大正先生的话,我认为既符合21世纪科学发展的大势,也符合西域汉语言文化的发展历史研究的实际。这使我更进一步坚定了多学科、多角度入手进行探索分析的信心。

## 二、需要率先廓清的几个概念

在研究过程中,我感到,关于西域等与本选题相关的几个概念,很有必要首先弄清楚。关于这几个概念的认识,近几十年学界确已多有研究,并取得了众多学者的共识。这里将其提出,无非是在引进共识,先予廓清的基础上,再展开对共同关注议题的讨论。

**西域** 西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地理概念。它的意思是古代中国西部的疆域。

西域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原指自秦汉以前,我国西北地区、甘肃西部,包括今天新疆天山南北及其以西的中亚、西亚、北非、地中海东岸,以及印度北部等广袤的地域;狭义的西域,是指河西走廊尽头的玉门关、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葱岭以东,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所管辖的天山南北的大片地域。就狭义的西域而言,主要是指清朝划定版图之前,河西走廊以西、今天新疆天山南北及其以西的部分地域。可见西域和新疆还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

关于西域,历史上早就同我国内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民过往密切。我国古代的许多典籍,诸如《穆天子传》《山海经》《管子》等,都对西域记之甚详。其中的许多古代传说,例如《穆天子传》中有关周天子宾于西王母,受到西王母热情款待的故事等,就是史前西域同内地联系的具体写照。我们这里要研究的西域同内地的关系等,是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内地封建王朝汉朝政权对西域主权领有开始的。

**汉族** 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它的由来有一个漫长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它的所指对象,同其他任何民族的名称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着的概念,并不恒指某一个固定的人口群体。

历史上的汉族曾经有过多种称呼。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正是它所指的这一变化着的人口群体,在新的情况下发生新变化之后的新所指。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在它的发祥地中原,称为“华”“夏”,也可连在一起称“华夏”。战国七雄的“秦”兴盛起来,统一了中国,周边各族群人们,就把中原的华夏人统称“秦人”。暴秦后被册封于汉中的刘邦所灭。刘邦就把自己所建的朝廷,称为汉朝。汉朝诞生,威慑天下。于是,周边的各族群,如南方的百越、北方的匈奴等,都称汉朝所辖土地上的人们为“汉人”。后来各朝也有被称呼“唐

人”的等等。直到辛亥革命,“汉族”作为与“满族”相对区别的称呼,才被固定下来。

很显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朝代发生的社会变动,我们这个国家的范围逐渐在扩大,特别是汉人同周边的少数民族相融合,族群便会不同于前。例如,春秋战国之前,夷、狄、蛮、戎融入了中原人之中。人们最清楚的是魏晋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和汉人的融合。后来还有契丹、女真、党项和汉人的相继融合。直至元朝灭亡之后,部分蒙古人留在各地,与汉人的融合,满族人在入主中原之后与汉人也有融合。于是汉族人口不断增多,族群便越来越大。这是必须看到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

所以,在本书中,自汉朝开始,尽量只用“汉人”“汉民”这样的字眼称说之,而不用“汉族”称呼它。之后偶有用“汉族”一词者,那大凡是在为了与其他民族的族别并称的特殊语境中偶尔用之。应该不至于造成概念的混乱。

**汉语**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今天我们称其为汉民族共同语,简单说就是汉族话,这是可以的。但是严格地说,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服务对象也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着变化。在华夏早期,它还只是一个不算大的人口群体所使用的语言。魏晋南北朝以来,匈奴、鲜卑等民族进入中原开始与汉人杂居一起,出于交际的需要,在本民族语言仍旧继续使用、本民族的自我意识还非常清晰的时候,就逐渐开始学习、运用起汉语来。对此,本书虽然仍然称呼这种语言为“汉语”,但事实上它的社会功能已经不局限于汉人交际使用。所以,自魏晋南北朝一章开始,书中虽然仍用“汉语”一词,但是对操这种语言的人,就不再称说是“汉人”“汉民”,而改说“说汉语人口”,以示说这种语言的人口中,不止汉民一种,还有其他民族中已经改说汉语,或者民汉语言兼通的人。

自明朝开始,因为中国诞生了回族,而回族在走向形成的过程中,元朝时候的回回人纷纷放弃他们先民所说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言,而把汉语当作自己这个新形成的群体之民族共同语。这样,中国说汉语的民族已不止汉族一个。所以,本书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为区别说汉语的人口中族别的不同,也有把“汉族”一词拿来与“回族”,后来又拿来与“满族”并称。这是必须予以说明的。

**汉文化** 直观地从这个简单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看,把它理解为“汉族的文化”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决不能就这样简单从事。如前所说,汉族这个称呼固定下来是很晚

的事。实际上,汉文化同汉族的发展一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外延和内涵都在不断变化着的一个复杂概念。

“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诚如罗常培先生提到的另一位人类学者戴乐尔(E.B.Tylor)所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行为习惯。“汉文化”在“文化”之前又冠以“汉”字这个限制成分,使其所指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畴,从而有了它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于是,对其予以新的、科学的、严密的逻辑限定。

汉文化的提法,最早也只能是从有了汉朝时候才这样提。那时,汉人这个大族群,已是中华各民族中的主体部分。汉朝之前,早就有了关于这个人类群体文化的记载。例如,周口店文化、元谋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后来又有距今时间更近了一些的河洛文化、商殷文化、周秦文化,再往后的湘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等。它们后来融汇聚成一体,成为汉文化的基础。

汉朝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机构,开始独尊儒术,把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被人推崇的孔孟儒家学说视为至尊的思想理论。自此之后,孔孟儒家学说,连同墨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信仰以及后来的佛教、道教,就成了汉文化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其他民族的某些固有文化成分,不断融入汉文化,使其外延和内涵都不断有所变化和发展。

隋唐时期西域的突厥、回鹘文化的传入中原,辽、宋、金时期的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党项文化,还有南方闽、越等各地各族的文化,都有与汉文化交融的历史。其融入汉文化,亦无异议。

到了元朝、明朝、清朝的蒙、满两大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的深度渗透,远远超过前朝任何一个朝代。元代西域东来的大量移民,特别是元朝“遍天下”的大量“回回”,经过元明两朝,形成了新的兄弟民族回族。元朝时期西域(特别是今新疆)畏兀儿族和中原的文化交流,明朝时期大量蒙古民众居住于全国广大汉民区和西域的多民族聚居区,形成了深度文化交流。因此,这时“汉文化”的外延和内涵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我们对它的理解认识,更不能狭隘地只停留在汉唐时期那个境地。事实上,这时“汉文化随着历

史的不断发 展,已经成为以汉人传统儒学思想、佛教道教信仰、汉语言文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文化的集大成”。所以,自元朝始,本书索性将“汉文化”改称“中华文化”,以符合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真实。

### 三、本书的内容构架

本书主要在于关注古代西域汉语通行的历史,所以,我们既要考虑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以中原王朝兴亡的传统分段方法,又必须顾及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一部分的西域在各个朝代里的史实。这样,我便结合西域的具体实际,将中华有记载的两千多年漫长历史,分成汉朝、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蒙元、明朝、清朝七个史段。每一史段自成一章。每章之内,节数虽然不尽一致,但大致都有如下几大部分内容。

(一) 各朝代中原王朝的社会政治形势 该部分简要交代各个朝代的内地中原王朝(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和当时西域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彰显西域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安排这一内容,旨在将西域放到全国的大政治背景中,与全国联系在一起,以便于认识二者之间内在的各种有机联系,明确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认识,了解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之社会人文背景。各章的这一部分文字简约程度不等,原则上,以能见出西域同中原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度。

(二) 各朝代内地说汉语人口的向西流动 在了解各朝代的特定政治背景之后,梳理、罗列内地说汉语人口(汉民和其他民族居民),以各种方式向西域流动的重要线索,借以掌握汉语在西域通行的社会基础。因为要借助历史资料说话,所以,在这里笔者坦言,对历史学家著作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及其分类认识,基本上是采取“拿来主义”照搬、借用。除了对史学家的辛勤劳动道谢之外,少有人独立进行的考据和甄别。如此生吞活剥,诸如舛错之类,实恐难免。至于列举难以罄尽,更是必然,希冀无伤大局。

(三) 各朝代西域说汉语人口的数量和分布 该部分旨在综合、分析、推断各朝代西域说汉语人口的有关情况,推测、把握西域说汉语人口的数量和分布,借以对西域汉语的通行情况做出较为科学、可信的判断。这一部分是全书各章据以立论、突出中心观点的主要依据。立足于历史材料进行综合加工,少不了个人拙见掺杂。说话的主要依

据,虽仍然不能离开史料,但是,既然是想借助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进行一种探讨,就不可能完全采用史学家严格考据的治学方法。于是,根据社会生活逻辑与一般规律进行推测,也算是一种大胆尝试,权当是抛砖引玉。

(四)汉语在西域的通行、汉文化在西域传播的情况 这是每章的核心,突出全书中心的部分。该部分着重用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观点,概括、分析、评价各朝各代汉语在西域的通行态势,进而透析、论证当时西域汉文化的传播,认识汉语在西域通行、汉文化传播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或者透过某种文化现象,帮助印证、了解当时汉语在西域的通行。

关于突出中心这一部分,各章情况不等。多数时候将该部分分作两节来写。一节抒写汉语的通行情况,一节突出强调因汉语通行而促进汉文化的传播情况。

至此,需要对上面各章行文中的一个常用措辞加以说明。行文中所用“通行”一词,是个广义的概念。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行、用受社会的影响,而往往会有某些变化,决非恒定的、绝对普遍的意思。例如,西辽全国通行汉语,这是西辽政府法定的语言文字使用的事实。但是,西辽境内突厥、回鹘人聚居的地方,可能有许多人民群众不会说汉语。这样,我们就不能说那里“不通行”汉语,因为政府发行的钱币、政府所行的公文在那里通行,都意味着汉语汉字的使用通行是个客观事实。又如,明朝时候,西域的许多“地面”和“国”,都通行本地民族语言,但是也不能说那里“不通行”汉语,因为汉语毕竟是明朝政府的官方通用语,当地仍杂居着一定数量的汉民、回民,他们必定还要使用汉语和汉文;西域各国和地面都还要用汉语汉文和明朝中央交际往来。这当然也是汉语“通行”的客观事实。

本书以期用事实证明,汉语确实自古以来就在西域通行,各朝各代连绵不断,而且今天新疆的汉语方言和内地其他各省的汉语方言一样,是从古汉语、近代汉语直至现代汉语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最终,希冀通过对西域汉语历史地通览,窥见历朝历代汉语在西域的通行概况,透过汉语在西域社会的通行,分析认识汉语通行给西域带来的汉文化影响,认识这些文化现象因为汉语在此通行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意义、文化意义。

#### 四、关于方法运用方面的几点说明

与上述各章节有关内容的阐述,特别是方法运用方面,必须在此予以说明,以免误解。

(一)关于第二手材料 治学重视第一手材料的运用。本人是历史学的门外汉,在史料运用上,不可能全靠自己从历史典籍中亲自涉猎、搜集。于是,依据有关历史著作中现成材料,或者循着有关著作所引资料的相关线索寻找所需资料,即直接或间接地从现成著作里“拿来”,自然是最省力、最有效的办法。这方面我几乎完全是仰赖历史学家现成的劳动成果。如果依此指摘我多用第二手材料,不无道理。然而,与其等着别人批评,实不如自己自责为好。这是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二)数学方法的运用 在某些地方的论述过程中,笔者不揣冒昧地尝试采用了数学的方法。诸如运用数学中排列组合方法推测汉语的组词能力,运用数理统计学中的“中数”等概念,也许有人会持否定态度。运用这一方法,就我来说也只是一种尝试。先哲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的发展。显然这一论断,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鄙人依之学着画葫芦,大胆尝试也是一件有趣的事。至于数学方法在此运用是否恰当,是否真正能够帮助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这正是鄙人冒昧尝试的目的。

(三)逻辑推理等方法的运用 史学有史学的方法,语言学有语言学的方法。特别是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它们都还在发展之中,有许多问题的研究方法,本身还在探索。因此,本书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中,所用方法也算是一种尝试。例如,对社会人口动态中的推测,许多时候在无确凿数据为依时,往往在运用逻辑推理方法的同时,常掺杂进社会学的生活经验、历史经验的因素。这在某些行当看来,大有“凭空想象”的“唯心”之嫌。前朝遗留人口的推断,在只有朦胧人口线索的情况下,对人口数量的估计,都有此类方法的运用。凡此,自知科学信度含糊,已经尽量挤出水分,以期服人。所得认识,仅供参考。

#### 五、关于材料取舍问题的补充说明

社会的人口流动是互动的,古今中外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总是相互往来的,于是就会出现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的社会人口的互动。中国历史上,人口众多的汉



民,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而向西迁徙流动,是历史上经常看到的强势流动现象。而西域其他民族以种种原因的自西向东流动,也时有发生。唐代回鹘的西迁高昌,清初回鹘的东迁河西等等,史书都多有记载。因为本书的宗旨是,专门关注汉民到西域参与西域开发建设,借以研究汉语在西域的通行情况,所以,对于历史上其他民族的人口东渐,书中一概未予涉及。

语言、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语言、文化,作为两种社会现象,它总是随着人在社会上的运动而传播的。操某一语种的人走到哪里,这种语言和文化,就传播到哪里。一种语言和文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种语言和文化就会对那里的社会产生影响。同时,那里的语言和文化也会对新来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简言之,语言、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历史上,汉人到达西域,把汉语、汉文化带到了西域,在西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西域人到了中原,也把西域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带到了中原。例如,龟兹音乐、西域歌舞,甚至服饰、习惯等,这都是历史事实。

本书的宗旨是研究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对于西域民族语言和文化在中原的传播和影响,一般未予涉及。因为元朝时期蒙古人促成的东西方人口大流动,异于从前。回鹘和回回大批进入中原,造成东西方语言文化的深度相互影响渗透,书中有所反映,其余则略。这里也予以说明。

语言、文化的影响,涉及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文化,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本书既然要透过历史文化观察汉语在西域的通行,当然就会涉及西域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各个方面。在此,我不得不自惭形秽地说,才疏学浅,不敢妄言一一涉及。尤其是关于物质文化方面,农业生产、手工业技术、商业流通等等,除与语言的传播有直接关系之外,它们还和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这些都是我所不懂的,万不敢轻率染指。就是单以精神文明方面来说,它也涉及许多方面,诸如民族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法律、民俗等等,鉴于自己缺乏研究,凡涉及这些领域处,我们只挑明它因汉语的通行而得以传播为止。因此,各朝各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播等有关物质文明方面,尽量不予涉及。这也是必须予以说明的。

## 第一章 汉朝时期(前 206—220)

汉语从此在西域成为官方通用语 002

### 003 第一节 汉之开发西域

#### 003 一、汉朝的建立

#### 004 二、汉初的西域概况

#### 006 三、汉朝对西域的管辖治理

### 008 第二节 汉代汉民人口的西流

#### 009 一、官方行为的人口流动

#### 011 二、民间自发的人口流动

### 013 第三节 汉代西域的汉民人口数量与分布

#### 013 一、汉代西域的汉民人口数量

#### 019 二、汉代西域汉民人口的分布

### 023 第四节 汉语从此开始在西域社会通行